

语言单位:居间介质与话语链

——谨以此文纪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一百周年^{*}

山东大学 屠友祥

提要:从意义整体确定单位,展现了心智的纵向聚合的一面,其中居间介质是最重要的表征,同时横向组合的一面,则是从话语链呈现单位。居间介质是概念和听觉印象的相互蕴含体,是“形式—意义”的相互结合体,而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是居间介质的确立者。构成对置的,不是形式(能指)和意义(所指),而是属于外在现象的发声形象和属于内在意识现象的居间介质(形式—意义,声音—思想),后者有言说主体的意识的介入。索绪尔刻意重视共时态,也是由于以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为出发点的缘故。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存在于共时态之中,展现其以有限之符号表现无限之意义的力量。“声音—思想”(形式—意义)这一居间介质是思想差异与声音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居间介质就隐含着区分作用,这是凭借居间介质确定单位的原因所在。语言意识的呈现框架是言说主体的视点,视点造就关系,同时也造就居间介质。居间介质这一概念可能使我们以前对索绪尔理论的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关键词:单位、居间介质、话语链、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共时态、视点、关系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6)03-0323-12

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道语言充当“思想和声音之间的媒介”(索绪尔1980:158)，“媒介”(intermédiaire)一词，Riedlinger (Saussure 1997: 21) 和 Par-tois(同上:121) 均记录为 un milieu intermédiaire(居间介质)。我觉得索绪尔以同义叠用方式强调这是关键概念，Bally 和 Sechehaye 省略 milieu (Saussure 1916:156)，减弱了这一强调，使关键概念降为普通概念。本文首次发掘或恢复居间介质这一核心观念，意欲有效探明索绪尔语言单位理论的内在脉络。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符号科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突破”(12JJD750014)的阶段
性成果之一。

—

语言单位不是个外在的、已有的、固定的存在物,它是通过言说主体的心智凭借共时存在的形式(符号)的对立、差异而确定的,也就是说,这是心智运作而成的抽象单位,不是现成的具体单位。即使存在着词这样的具体单位,要判定它所具有的单位之所以为单位的特性,也必须经由心智运作,所以归根到底词也是抽象单位。这种从意义整体看待词或者说确定单位的方式,展现了心智的纵向聚合的一面,隐性或抽象的一面,而横向组合的一面,显性或具体的一面,则为从话语链、句子看待词或者说确定单位的另一种方式。索绪尔自己也明确说:“审视语言的内在特征,它一开始并不呈现种种具体单位,然而我们不能否定存在着具体单位”(Saussure 1997:120)。这是抽象之整体语言所特有的现象,正是这种抽象单位和具体单位、纵向聚合和横向组合的交织构成了完整的抽象之整体语言。具体单位从句子中呈现出来。索绪尔曾对词与句子的关系做过独特思索,他在《杂记》(Notes Item)中写道:“我们可能在学会词之前已经学会了句子……这等于确认所有抽象的整体语言最初都是通过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智”(Saussure 2002:118)。可能在学会词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句子,这意味着我们在掌握或意识到抽象单位之前可能已经掌握或意识到具体单位的展现域——句子或话语链,也就是说,心智单位是隐性的无意识单位、无形的单位,具体单位是可感可知的,如此,显性的句子或话语链就成为确定词、确定单位的必不可少的场所和途径。话语链、言说链呈现于听觉印象,是线性的听觉符号,前后相继,具有时间性。我们面对的是时间性的听觉印象,这是一种无形的声音现象,如何令无形的现象凝定为有形的现象,使之可以确定,这是形成单位的前提。我们注意到索绪尔就此问题提出了“居间介质”(un milieu intermédiaire)的重要概念,这可被看作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核心和精髓。他说:“我们思考对象,我们把词本身看作对象。如此,语言的质料层面是无形的,发现语言单位存在于何处是困难的,无形性是解释这种困难的一个理由,语言学应探究这些单位究竟是什么。对单位的这种确定是刻不容缓的,与思想相对的语言的特有作用不是成为表达思想的语音手段,而是创造一个居间介质,诸如概念与声音之间的居间之物,而这居间之物最终导致单位的产生。如此,思想就不得不变得明晰而确定,因为它不得不分解成种种单位,划分为种种单位。这不是思想凭借声音而实现的具体化(声音是有效有用的现象),而是蕴含思想之声音包含了种种划分,种种划分形成语言学的各类基本单位”(Saussure 1997:121)。“概念与声音之间的居间之物”,“蕴含思想的声音”,这些说法明显意味着意义的介入。我们对索绪尔居间介质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一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含有

思维意味的声音”(le son-pensée),或“具有声音的思维”(la pensée-son)(参见 Saussure 1997: 121)。在索绪尔心目中,这时候“概念具有听觉实体的性质,就如声音具有概念实体的性质一样”(Saussure 1993: 292),这是一种相互蕴含的状态。这时候,概念和听觉印象的相互蕴含体是一种具体的实体,正因为是具体的实体,我们就可以划定其界限,从而确立单位。当然,这种具体的实体,这种相互蕴含体,是通过言说呈现的。在言说中,此概念与此听觉序列的重合或对应反复出现,于是,两者之间就具有同一性。同时,具有重合性或对应性的此概念和此听觉序列与另外具有重合性或对应性的彼概念和彼听觉序列相互区别。整体之符号内部概念(所指)与听觉印象(能指)相互蕴含,形成同一性;此整体之符号与彼整体之符号相互区别,形成差异性。我们就凭借同一性和差异性确定实体,划定单位。

二

言说主体自然而然地运用语言,他能不假思索地把握并即刻确定单位,就是凭借言说主体自身的语言意识,凭借对意义的感知。言说者的语言意识成为最根本的依据。言说主体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不同时段都屡屡谈及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认为索绪尔学说忽视主体,道其理论基点在“无主体之结构”,例如丁尔苏(2000:58)即持此论,认为“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静止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上帝般的自我运作能力,它分别在声音和思想连续体上进行切割,产生一定数量的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对应,这就是结构主义所说的‘符号’。这样定义符号既排除了语言主体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也割断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意义研究的贫乏”。说索绪尔“排除了语言主体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这看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将外在事物排除出去的理由,可参见屠友祥 2013)。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本质上是语言现象学理论,其立足点在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他在 1908 年 12 月 3 日就说:“言说的主体所感知到的,某种程度上使他感知到的,正是意义。如此,我们可以说,在抽象的整体语言中完全不是那么容易地把握住的具体之物、真实之物=所感知之物,转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义之物。有意义之物则表现在对单位界限的划定上面,正是意义创造了单位,单位在意义存在之前并不存在:单位并不是为了接纳意义而存在”(Saussure 1997: 24)。“在语言当中,总是需要语音材料大体上划定语言本身在时间中的界限。必须划定聚成一体的块团的界限。必须区分抽象之物与非抽象之物,而区分的根据则是所感知之物:也就是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具体之物/真实之物=所感知之物=含具意义之物。含具意义之物是通过对诸单位界限的划

定而展示出来”(同上:122)。这里,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成为意义的唯一确定者,而意义则成为单位的唯一确定者,那么,起最根本作用的,就是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意识是构成意义的基石。而意识现象是内在现象,在索绪尔那里,“内在意识”(la conscience intérieure)与“语言感”(le sentiment de la langue)是同义语(参见 Saussure 1997: 61; 索绪尔 2012: 111)。我们看到,索绪尔心目中的内在现象或意识现象,指的是听觉印象与概念的相互蕴含体,或者说是“形式-意义”(la forme-sens)(参见 Saussure 2002: 17, 2011: 72)的相互结合体,因为意义和符号(形式)都是纯粹意识的事实,都属于心智或精神的范畴(参见 Saussure 2002: 19, 2011: 116),它们具有同质性。可直接听见的外在现象则是“发声形象”(声音形态, la figure vocale)(参见 Saussure 2002: 17, 2011: 72),因此,形成对立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形式(符号)和意义,而是发声形象(声音形态)和形式-意义。从索绪尔的橘园手稿,可明显感觉到他对居间介质的注重。我们通常说符号和意义,或者说形式和意义,或者说能指和所指,将两者对置。但索绪尔将两者看成相互蕴含体,这一相互蕴含体也就是居间介质。构成对置的,是属于内在意识现象的居间介质(形式-意义)和属于外在现象的发声形象(声音形态)。也就是说,构成对立的,是有意识介入还是没有意识介入。没有意识的介入,是纯粹客观的物质的声响,有了意识的介入,则是声响的精神印记。倘若言说主体的意识对发声形象(声音形态)予以确定或界定、限定,那么,这发声形象(声音形态)就成为形式(符号),反之,则是纯粹的发声形象。我想,这一理解是对索绪尔所谓“将形式和意义相对立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完全是行不通的)。而将发声形象(声音形态)为一面与形式-意义为另一面相对立,才是确切的”(Saussure 2011: 72)这一论断的确解,这是索绪尔思想的根本所在,可能使我们以前对索绪尔理论的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居间介质”正是掌握形式-意义的关键。具体现象作为外在现象,其存在方式是孤立的,而意识事实则处于关系之中,它是一个完整体,当然,这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完整体。抽象的整体语言也是一个完整体,一个自足体,它也在关系当中存在。它并不需要外在现象或依赖于外在现象。索绪尔有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就是认为外在现象和内在现象并不是均衡和对称的。他写道:“抽象的整体语言,从其内在方面看,是完足的。从其外在方面看,显然是不完足的;但就此而以为外在方面与内在方面两者之间存在均衡和对称,则是非常错误的。抽象的整体语言,从其内在方面看,是完全完足的;在外在事实与内在事实之间产生无法改变的不均衡性,〔索绪尔原稿破碎〕……呈现为相互补充的状态〔原稿破碎〕……在外在事实或内在事实构成〔原稿破碎〕……之物的时候〔原稿破碎〕……”(同上:73-74)。也就是说,外在事实与内在事实两者之间并不呈现出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状态,内在事实完全可以脱离外在

事实而独立存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完足体。

索绪尔的研究刻意重视共时的状态,其中的根本原因,我想就是由于以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为出发点的缘故。以言说者的意识与感知为依据,从而确定意义和单位,这显然处于共时的状态,或者说是语言事实在言说者意识中的共时性关联。索绪尔说道:“这种语法学家、语言学家的视角拥有当作基准来用的言说主体的视角,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寻思言说主体的印象是什么。为了知晓在什么程度上某物存在,就应当探究它在什么程度上存在于言说主体的意识中,它在什么程度上进行意指。因而只有一个视角和方法:观察言说主体所感觉到的东西”(Saussure 1997: 49)。言说主体所感知之物处于当下的共时状态,它并不回溯到某个语言事实、某个词的初始形态,也不去构拟、展望其将来形态,也就是说,不在历时性关联中思考语言事实。一切都以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为出发点,实际上就是一切都以意义以及凭借意义而确定的单位为出发点(意义和单位是相互确定对方的),言说主体感知到意义,感知到差异的形态,感知到差异的功能和作用(差异以形态上的区别性特征而产生作用,形成意义和单位。这里,形态与功能是合一的),意义是一个基于差异的系统,而系统则处于共时的状态〔差异也同样处于共时的状态。均处于共时态的系统与差异构成语言的特征。索绪尔(1980: 151)曾说:“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事实或存在是言说主体的语言感造成的,感知到者,即存在者,反之亦然,存在者,即感知到者。索绪尔(2012: 112)甚至断言:“把语言意识所辨识、认可的视为真实的,将其没辨识的看作不真实的”。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是通过横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展现的,也就是通过共时性之物展现的。共时性之物处于系统之中,系统的存在,使得其中的诸种价值得以实现,或者说得以运作。索绪尔(同上: 111)说:“语言内共时地存在的事物是一种均衡”。我们也可以说系统是诸种充满张力之价值的一种均衡。言说的线性展开是具有差异关系的单位的展开,联想关系则是处于潜意识中的思想活动的表征,是对各种差异关系的进一步引生与强调,这两者是共存的关系。索绪尔(同上: 112)将共时性之物称作语法,归纳出这样一个等式:“语法的=意义的=归属于一个符号系统的=自然而然的是共时的”。我们可以如此体会索绪尔使用“语法”一词的涵义,即语法就是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所辨识、认可的,这时候它就是真实之物。所谓真实,就是具有价值,而价值是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赋予的,是把它纳入系统(整体)中才具备的,并不是其先天就有的。凡是进入了系统(整体),进入了同时性的关系,就具有了意义和价值,成为真实之物,成为实体和单位。我们就是凭借语言事实,研究和确定单位问题。索绪尔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地或极其强烈地区分共时态和历时态,原因就在于“只有共时态才形成系统,历时性事实只能改变这系统,

历时性事实只是再现了相互没有关联的孤立的事实的总和”(同上:122),“每当我们思考共时性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处在系统内;历时性事实并不引出系统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不能同时进行这两种研究的缘故”(同上:123)。存在于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里的,就是共时的现象,即便追溯各个语言符号的历时渊源,各个符号之间存在的也是现存的秩序、共存的价值关系。共时性、同时性产生并确定了价值和意义。我们从索绪尔对静态语言学的界定也可看出言说主体的集体语言意识与共时态、系统等不可分的紧密关联:“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索绪尔2007:141)。各项关系之所以构成系统,就是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语言意识。

价值处在关系之中,或者说是关系决定价值,然而共时性的关系是偶然的,我们就凭借现时现刻的偶然性造成的价值掌握语言事实。如此,共时态可以摆脱历时态。索绪尔甚至以绝对的口吻做出表述,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他(2012:121)说:“特定时刻整体语言当中所存在的,就是对过去之物的彻底废除,认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唯一的途径。完全地研究历史之物,必须如此做,以便此后发现共时性事实。没有比知道一个时期的起始更重要的了,但必须彻底废除它,以便掌握静态(共时态)。演化、历史、历时的视角操纵着众人,只要我们超越它、偏离它(也就摆脱了被操纵)。……我不是凭词源学,而是凭现存的价值进行探讨,现存价值本身完全独立于形成它们之物。它们之具有价值在同时共存之物,而不在前于它们的事物”。词的价值在于现存的词与词的关系,而不在形成此词的词源。因此,只有摒除历时性视角,才能发现共时性事实,或者说凸显共时性事实的纯度。譬如汉语中的“至今犹然”的“犹”,与表示动物的“犹”毫无关系,必须摒除或忘却动物意义的“犹”,彻底废除或者说抽空“犹”的词源意义,方能呈现“至今犹然”之“犹”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变异和创新之处,其间存在的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我们任意地拿表示动物的“犹”这一符号转而来表示“至今犹然”之“犹”的意义,符号与意义之间完全是任意的关系。正是由于任意的关系,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使得有限的语言符号可以表达近乎无限的意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性两者在语言符号形成和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永远是存在的,这正体现了语言符号本身的活力。因此,质疑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任意性带来的以有限表现无限的惊人力量。

如此,价值是由关系决定的。语言单位并不预先确定地存在,因为语言事实、居间介质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地存在的,是差异。只有差异和区分,或者说关系,才能形成价值,进而形成意义,确定单位。可以用这样的图示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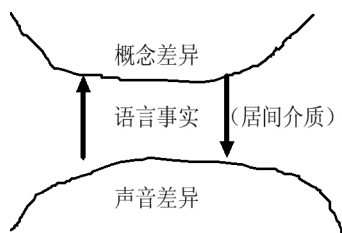


图 1. 居间介质形成图

一方面,概念与概念之间形成差异关系,声音与声音之间形成差异关系,概念差异与声音差异互相依赖,两者结合起来,从而确定某一语言事实或要素或单位。因此,语言的同一性或者说单位是关系或形式的同一性或者说单位,并不是实体的同一性或者说单位。索绪尔(1980:80,169)道“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我想也是基于此而说的。语言永远只呈现为居间介质(关系),而不是呈现为实体。

索绪尔(同上:157)谈到“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声音与思想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结合起来,就是因为声音本身隐含着区分,思想本身隐含着区分。区分导致结合。居间介质使得单位能够确立,因为居间介质本身就隐含着区分作用。思想与声音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使浑沌的思想区分开来,也不可避免地使无定形的声音区分开来(语音的运作机制是差异,此音区别于其他音,此音才具有价值。差异是变易的、不确定的,那么,价值也是相对的、变易的,不是绝对的、确定的。价值通过差异来显现)。概念差异与声音差异的彼此结合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语言事实(居间介质),这使得“思想—声音”(居间介质)本身也隐含着区分,我们由此而拥有了单位。如此,最具生命力的,恰恰就是居间介质,这正是语言学最应该研究的现象。

三

语言单位的确定,我们说过,是经由言说的主体的语言意识进行的。语言意识的呈现框架就是言说主体的视点。我们看到,索绪尔对言说主体的视点、观点问题做了专门的思考,认为语言科学的对象不是预先确定了的,而是“视点创造了对象”(索绪尔 1980: 28)。索绪尔对此一以贯之,在不同地方都分别做了表达(参见 Saussure 2002: 19, 2011: 116-117)。语言事实、居间介质不是客观地存在于视点、观点之外,而是有了视点,才产生了语言事实,或者说才可能把握语言事实。问题在于观点、视点的形成。观点、视点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同一性的确立过程。言说主体的观点、视点决定了发声形象(声音形态)与形式一意义两者这种二元性的结合,转而形成同一性;同时这一整体之符号与那一整体之符号形成差异性;由此同一性和差异性构成语言事实。另外,索绪尔对语言事

实做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探究,同样也是一种视点。他对语言事实做抽象的整体语言与个体语言的区分,对横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关系性和空无性及线性特征等的思考,都是为了确定语言事实和单位而采取的种种合理或合乎科学的视点、观点,也都是由于语言科学没有客观而现成地存在着对象而导致的。语言实体之所以具有价值,是言说主体的视点赋予的,也就是说,是言说主体一般化、抽象化的心智作用的结果。正因为这点,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索绪尔这样阐述视点问题:“存在着不同种类(genres)的同一性。就因这点,才创造了不同型式(ordres)的语言事实。脱离了某种同一性关系,某种语言事实也就不存在。然而同一性关系依变化不定的视点而定,依人们决定采取的视点而定;如此,只存在负责起区别性作用的明确的视点,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语言事实的雏型(rudiment)”(Saussure 2002: 200)。“语言中决不会发现独立存在的个体,亦即不会发现凭自身就能确定的存在(或量),尔后就这存在(或量)实现普遍化。语言中首先存在的就是普遍化(一般化),而且只存在普遍化;既然普遍化必须设定一个视点(作判断依据来用的视点),那么,语言学家关注的最初而最不可简化的实体就已经是心智潜在运作的结果了。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语言学不是回到[确认事实]上来,而是实在地回到合理视点的讨论上来;没有合理的视点,也就没有(语言学的)对象”(Saussure 2002: 23, 2011: 88)。“语言中首先存在的就是普遍化(一般化),而且只存在普遍化”,也正是因为这点,我们不惮其烦地将索绪尔的单数 la langue 称作“抽象的整体语言”,复数 les langues 称作“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亦即汉语、德语、法语等等民族语)。抽象之整体语言这一名称体现的就是其一般化、普遍化意味。含混地用“语言/言语”(我用的是“抽象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这一说法,而不进一步将“语言”作“抽象的整体语言”和“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的区分,就没有领略到索绪尔理论的精髓所在。索绪尔 1911 年 5 月 5 日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第三章之前,补充说应在第一章结尾处添加对整体语言做界定的内容,道:“这是我的整体语言的概念,显然,我们只有经各式各样具体的整体语言系列,才能描述抽象的整体语言。我们惟有通过任一种特定的整体语言,才可理解抽象的整体语言。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这个单数的词,如何解释、论证它呢?我打算将其普遍化,对任何特定的整体语言来讲,它都会处于恰当而有效的状态,无需被迫明确指定。不必认为这个一般性的术语——抽象的整体语言,与群体语言(langage)相当”(索绪尔 2007: 83)。索绪尔强调语言中首先存在的且唯一存在的就是普遍化,意在指明其一开始即为心智潜在运作的结果。语言中的一切要素能够成为实体并具有价值,都是我们抽象化和一般化运作的结果,都是纳入观点、视点的结果。也就是说,固定的实体并不先在地存

在,惟有经视点、观点及抽象化的运作,方才存在实体,进而产生价值。然而就视点而论视点,视点也是不具确定性和必然性的。1893-1894年,索绪尔对普通语言学提出构想,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完全没有真正必然的出发点(引按:视点)……不存在一个出发点比另外一个出发点为论证提供更合适的基石”(Saussure 2002: 198)。视点唯一可以确定之处,就是它掌管着区别性作用。我们因由区别性作用而获得同一性关系,或者说,视点决定了同一性关系,那么,视点是关系的导致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直接说,视点就是关系。

在索绪尔理论中,关系论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看到,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并不是先有事物,尔后有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先有关系,先有视点,正是关系和视点决定了事物的存在。索绪尔是这样阐述的:“在这个领域(引按:指语言学研究领域),我们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先于事物本身而存在的,并用于决定事物。别的领域是(先)有物,有特定的对象,尔后可灵活地用不同的视点探究这些对象。在此则先有视点,无论对错,皆惟有视点,凭借视点,我们继而创造事物。出发点(引按:视点)正确,这些创造就处在与现实相符之地,不正确,则不相符;然而这两种情景之中任何事物、任何对象即便瞬间也都不是由其自身呈现的。哪怕涉及最为具体的事实,乍看起来极其明显由其自身而确定的事实,譬如一组语音,也都不是由其自身呈现的”(同上:200)。对象不确定,确定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看到最重要的是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正是言说者的语言意识确定了关系,关系确定了对象。这一对象,或者说语言事实,或者说居间介质,都是凭借关系而呈现的。在索绪尔的理论中,不是物质的声音与概念相对,而是物质的声音与“声音—概念的群集”(le groupe son-idée)(同上:202)相对,声音—概念的群集就是居间介质。物质的声音可凭借自身而独立呈现(但它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声音—概念的群集或居间介质则必须凭借关系而确定和呈现。一旦凭借关系而确定和呈现了,那么,这确定和呈现的,就是单位。

索绪尔对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看法,除了展现其视点之外,实际上也显示了他对符号和思想问题的深思。索绪尔道:“不是思想创造符号,而是符号在根本上驾驭思想(因而实质上就是创造思想,反过来促使思想创造符号,这些创造的符号通常与思想已经接受的符号没有多大区别)”(Saussure 2002: 46, 2011: 69)。虽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经由符号和思想的双向运作,有限的符号可蕴含无限的思想,或者说可创造无限的思想。这种双向运作是在共时态的层面上展开的,摆脱了与历时性的联系,而且也只有摆脱与历时性的联系才能展开双向运作(符号创造思想、思想创造符号这一在共时态层面展开的双向运作具有任意性),倘若从演化或历时的角度考虑已经接受的符号,那么,我们就不能完美地使符号任意地蕴含或创造我们想要蕴含或创造的思想,因为已经接受的符号本身也已经蕴

含了某种思想。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索绪尔的论断：“语言最重要的现象是思想和符号的联结；正是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在符号的传递过程中被消除了”（Saussure 2002：47，2011：71）。也就是说，旧的符号在传递的过程中与新的思想产生了联结，旧的思想与旧的符号的联结被消除了。因此，我们说符号驾驭、创造思想，思想创造符号，这一过程也就是指符号与思想产生联结的过程。这一联结是任意而约定俗成的。同时，与符号先前蕴含的意义或思想没有关系，倘若存在关系，则妨碍了旧符号与新思想联结的有效性和纯粹性。为什么联结会被消除，而且永远会被消除，词与物、符号与思想（物的意义）永远做不到固定的一一对应，就是因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思想的产生是无限的，而符号总是有限的缘故。我们想以有限表现无限，必须创造符号，然而这创造的符号实际上与原先的旧符号没有区别，但经由任意而约定俗成的过程，赋予了它新的思想和意义，因而是新的符号、创造的符号。再强调一遍，国内外所有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进行攻击的学者，实质上都没有把握住索绪尔思想的关键。

符号与思想、符号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与合一，是差异关系、居间介质的产物。其中的枢纽就是价值。索绪尔将价值与意义、功能等不予以严格的区别，原因在于它们是联类而及的。他写道：“在价值（valeur）、含义（sens）、意义（signification）、功能（fonction）或某种形式的用法（emploi）这些术语之间，甚至与概念（l'idée）这一某种形式的内容之间，我们都不确立严格的区分；这些术语是同义的。虽是如此，必须承认价值比其他术语都更好地表达了事实的本质，也就是抽象的整体语言的本质，这一本质就是形式不具有意义，而具有价值：这是基点。形式有价值，因此，形式意味着其他种种价值的存在。这其实是我们不断表明的基本点；其次，如果形式具有价值，而不是具有意义，这并不是允许意义〔与价值〕脱离开来〔引按：索绪尔此处句子未写完〕。不过，既然我们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不是偶然地谈论某种形式的价值（某种形式的价值完全依据这些一般意义上的价值），那么，处于符号世界，抑或处于意义世界，我们都会看到这是一回事；种种形式凭借彼此之间质料的差异而拥有价值，抑或种种形式凭借赋予这些差异以意义而拥有价值，两者之间没有一丝一毫可确定的区分界线”（Saussure 2011：168-169）。索绪尔将形式（符号）的内容、概念、意义、价值这些术语等同看待，同时将其与功能、形式（符号）的用法、运用等同看待。意义存在于运用，运用形成意义，两者不可分，因而是同义的。我们也可以拿维特根斯坦的话来理解索绪尔的观点，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维特根斯坦 1996：31）。

形式有价值，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共存要素的缘故。共存要素，一是“能交换的异物”，譬如二十法郎的价值在于可交换数斤面包；二是“可比较的同物”，

二十法郎可与一法郎或同等价值的畿尼比较(参见索绪尔 2007: 158)。正是共存要素决定了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存在其他种种价值。此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决定了此价值。换句话说,“形式有价值,因此,形式意味着其他种种价值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价值存在于系统之中。倘若没有种种价值和关系,也就不存在意义。功能或价值通过差异关系呈现出来,也可说通过形式呈现出来,如此,形式就具有价值,亦即差异关系是具有价值的差异关系。意义则凭借具有价值的差异关系而确定,最终意义和价值是合为一体的。据此,我们可理解索绪尔的“意义……取决于价值而又有别于价值”(索绪尔 2007: 156)的论断,以及“形式具有价值,而不是具有意义,这并不是允许意义〔与价值〕脱离开来”的观点。意义与价值的区别和同一是微妙的,令人体味不尽。价值处于符号世界,也就是种种形式(符号)凭借彼此之间质料的差异而拥有价值;价值处于意义世界,也就是种种形式(符号)凭借赋予这些差异以意义而拥有价值。符号世界与意义世界是同一的,就是由于差异的缘故,凭借差异而实现价值,同时价值也通过差异呈现出来。我们前面说过,居间介质隐含有区分作用、差异作用,符号世界与意义世界之所以能够合一,也是由于居间介质的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结果。

但差异是不可固定的。差异一旦固定,就失掉了差异的功能和作用。索绪尔道:“每个形式的含义(sens),从特殊的角度讲,与从普遍角度讲的种种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一回事。含义=差异的价值。然而种种形式之间的差异没法固定下来〔引按:索绪尔此处句子未写完〕”(Saussure 2011: 139)。前面引用索绪尔的话,说意义、含义是同义的。一般、普遍角度上的诸形式之间的差异,因其差异而可交换、可比较,从而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差异导致的,因而可说是差异的价值。每个形式与其他形式形成差异,这种差异关系确定了这个形式的含义,因而含义是由差异显现的,也就可以说是差异的价值的体现。从普遍角度讲,差异是永远存在的,或者说永远存在的是差异,而不是差异的两项要素。倘若差异的两项要素固定下来,那么,差异也就固定下来。符号、要素是有限的,人类的思维和要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如果差异固定下来,或者说差异的符号、要素固定下来,那么,就无法以有限的符号、要素表达无限的思维和意义。因此,种种形式之间的差异必定是不固定的,形成差异的过程必定是任意而约定俗成的,只有这样,才能以有限的形式呈现无限的意义。

差异不固定,差异的价值也就不固定,那么,价值的基点是什么?或者说不固定之中的相对固定点是什么?这依旧集聚到居间介质上来。索绪尔写道:“价值在根本上构成了语言系统(形态系统)、信号系统,价值既不建立在形式之上,也不建立在含义之上,既不建立在符号之上,也不建立在意义之上。价值建立在种种符号与种种意义之间某种普遍关系的特殊解决之上,依据种种符号的普遍

差异+种种意义的普遍差异+预先将某些意义赋予某些符号,或反过来,预先将某些符号赋予某些意义,〔引按:索绪尔此处句子未写完〕如此,首先存在形态上的价值,它们不是概念,更不是形式。其次〔引按:索绪尔此处句子未写完〕”(Saussure 2011: 170-171)。索绪尔这段话把居间介质的功用揭示得非常彻底。居间介质是什么呢?居间介质就是“种种符号与种种意义之间某种普遍关系的特殊解决”。差异是一种形态,因此,差异的价值就是形态的价值。形态的价值不是单一地依据形式、符号确定,也不是单一地依据意义确定,而是凭借居间介质来确定。居间介质的核心特质也就是差异,因此,居间介质本身就是一种形态。索绪尔特别强调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普遍关系、一般关系,其中缘由我想是着意于抽象的整体语言的一般性、抽象性、系统性,这种普遍关系沉积在全体人类的大脑当中,是人类心智和内在语言能力的反映。种种符号之间,种种意义之间,都存在普遍差异。这种普遍差异的存在具有同时性、共时性。种种符号与种种意义各自凭借自身的普遍差异而相互实现对方,彼此之间实现同一性,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完整体,一个单位。这种实现过程,是言说的主体的语言意识的展开过程。种种符号和种种意义之间的普遍差异关系,在具体实现对方的时候,都是一种特殊的解决和处理方式,因此,作为普遍关系的特殊解决,居间介质、语言事实、语言单位最终都呈现为具体实体。

参考文献

- Saussure, F.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 Paris: Payot.
- Saussure, F. de. 1993.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M]. Tokyo: Université Gakushuin.
- Saussure, F. de. 1997. *Deux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8-1909): d'après les cahiers d'Albert Riedlinger et Charles Patois* [M]. Oxford: Pergamon.
- Saussure, F. de. 2002.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 Paris: Gallimard.
- Saussure, F. de. 2011. *Science du langage: de la double essence du langage* [M]. Genève: Droz.
- 丁尔苏,2000,《语言的符号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索绪尔,2007,《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索绪尔,2012,索绪尔第二次普通语言学教程选刊[J],屠友祥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6): 92-129。
- 屠友祥,2013,指称关系和任意关系、差异关系——索绪尔语言符号观排除外在事物原因探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3):339-350。
- 维特根斯坦,1996,《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收稿日期:2016-01-08;修改稿,2016-02-08;本刊修订,2016-04-02

通讯地址:250100 山东省济南市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linguistic unit: *Milieu intermédiaire* and the chain of discourse (p. 323)

TU Youxia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o determine the unit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shows the paradigmatic side of the mind, in which *un milieu intermédiaire* (the form-meaning, the sound-thought) is the most important embodiment, while the syntagmatic side of the linguistic mechanism is revealed by defining the unit from the chain of discourse. *Milieu intermédiaire*,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th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eaking subjects, is uniting dynamically the concept and the acoustic image, the meaning and the form. What is opposite is not the form (signifier) and the meaning (signified), but the vocal figure that belongs to external phenomena and the *milieu intermédiaire* that belongs to the internal conscious phenomena. The latter involv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eaking subjects. The reason why F. de Saussure focuses his attention on synchrony is that he view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eaking subjects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arbitrariness of a linguistic sign, which exists in synchrony, is able to express infinite meanings with finite signs. *Milieu intermédiair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s differences and sounds differences, so it implies discriminating effects which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 The notation of *milieu intermédiaire* will probably lead to a fundamental change on our previous understanding about Saussure's theory.

Revisiting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Saussure's theory of linguistic value (p. 335)

XIA Dengshan & LAN Chun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value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F. de Saussure'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linguistics. Yet few agre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on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this innovative theory. A careful surve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shows that in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Saussure referred to relevant economic concepts quite a few times in developing his theory of linguistic value, yet in terms of the connotation of *value*, the theory has few connections with Walras'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rather, it resembles more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of Classical Economics. This is also evident in Saussure's comments on economic studies.

Investigation of Vygotsky's psycholinguistics —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znachenie slova* (p. 344)

LIU Xing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H. Mahn (Dept. of Language, Literacy & Sociocultural Studies,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 NM 87131, USA)

Vygotsky's psycholinguistics i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meaning-making processes based o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and circumstances. His focus is on the probe of the unification of speaking and thinking processes, and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entity created by this unification — an internal speaking/thinking system with meaning at its core. To interpret it, Vygotsky generates the unit — *znachenie slova* and explains the roots and the progress of *znachenie slova* as a unit of the speaking/thinking system. He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genetic,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human being internalizes meaning in the intersubjective condition and constructs it in an internal and psychological system. The basis of this system is the human being's capacity to generalize by using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in a meaningful interaction. Vygotsky'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skeleton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speaking/thinking system is essential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way of human being's producing *znachenie slova* of the sociocultural relations.